

# ——回忆杨永治等六烈士剿匪

## 殉 难 经 过

张兰田 刘昌林 邹绪良

吴武荣 张洪俊 刁少年

### (一)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县人民获得了历史性的新生，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县人民载歌载舞欢迎解放军，庆祝人民民主政权的诞生和建立。十二月上旬江津县人民政府成立，所辖十个行政区。第十区人民政府下属柏林、太平、紫云、双凤、四面五个乡。四面乡位于我县最南端，是山峦起伏，和贵州相连，交通极不方便的大山区。四面乡人民长期以来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和伪乡保人员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生活贫困，文化落后，解放前就是土匪、恶霸横行的地方之一。

### (二)

人民政府成立后，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征收公粮，支援前线，支援城市。十二月底，江津县征粮工作队分赴各区，各区组成工作组进住各乡宣传党的征粮政策和各项主张。元月中旬四面乡征粮工作组，由吴武城同志负责带队进住乡政府，积极开展工作，召开各阶层人民座谈会，深入群众，扎

根串连，组成了声势浩大的征粮活动。

伪乡长丁文皋是一贯鱼肉乡民的恶霸地主，人民政府成立后，他怀恨在心，区政府召开会议，多次拒不到会，妄图继续占山为王，独霸一方。暗中与柏林乡副乡长李永坤（即东胜一带）和国民党特务勾结，以伪乡保人员（包括乡丁、保丁）、恶霸地主，惯匪头子和威胁一部份不明真相的群众，组成一支号称一千多人的土匪武装，于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三日清晨举行土匪暴动。

二月十二日晚，在匪首丁文皋的亲自指挥下，将我住守在乡政府和烂坎子征粮收购点的全体同志重重包围。烂坎子工作组的同志刚起床，就被惯匪头子、土匪大队长何锡如一伙强行捆绑送到山王庙，以鸣枪为信号，通知四面街上的土匪。对我住守在乡政府同志进行武装攻击。吴武城、李昌智、刘安金同志，面对强大的敌人，进行了英勇的实弹反击，终因寡不敌众，吴武城同志战死在小学操场上。刘安金同志战死在场口的水田头。李昌智同志被枪杀在犁树萍。杨永治、张洪相、吴盛德同志被捉后，与匪首丁文皋等人进行了据理斗争，至死不屈。刽子手们将杨永治等三人用乱刀砍死在场背后老鹰石，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老鹰石，人民群众沉浸在无限的悲哀之中，刚获得解放的四面山又重新笼罩着一片乌云。

### （三）

二月十三日下午，第十区政府得知四面乡土匪暴动的消息，立即由区委书记李葆良同志带领区干队（区干队是由解

放军和公安战士各一个班，其余是刚从各乡抽的乡丁组成），深入四面乡清剿。部队深夜到达四面乡街上，周围都是喊杀声、枪炮声，从四面乡抽调的一个班武装因战场上叛逃投敌了，其余乡丁也没有打过仗，陆续脱离了区干队，敌众我寡，情况十分危急，区干队只好边战斗、边撤离。十四日返回柏林，十五日区政府全体人员到达紫云乡，十六日进住太平乡砖房临时办公。

十六日下午，东胜一带的土匪一百多人由贺西林、李永恒（均为土匪中队长），带领抢劫了第十区政府保留下来的粮食和枪支弹药，抢劫了石坝湾公粮。住守在柏林上场口、柑子林、山堡上三个碉堡里，烧杀抢劫，危害人民群众。

#### （四）

经过短期的侦察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一〇四团三营全体指战员，二月二十一日从蔡家岗出发，兵分中、左、右三路对四面、柏林形成大的包围。右路军一个连由南下干部张兰田同志带领，经紫云、复兴、头道河、红海等地直攻四面山。二十二日下午五时许战斗在四面街上打响，愤怒的枪炮声打得敌人心惊胆战，魂飞天外，部队到达四面山时，匪首丁文皋还座在茶馆喝茶，闻得解放军到来，拔腿就跑，被当场击毙在街上。碉堡里的土匪被包围打得焦头烂额，全部被俘。其余土匪当即四处逃散，土崩瓦解。

左路一个连由区长朱庆常同志带领，经太平埂、清溪沟，二十二日下午二时左右，在柏林山堡上、大殿子等地同时打响战斗，住山堡上的土匪中队长李永恒被击成重伤，虽

逃走了，但后来又被同伙打死。当天部队住东胜街上，冰天雪地，露宿街头，群众称赞：“真是人民的好子弟兵”。二十三日上午赶到四面街上，两路合兵，欢庆胜利。一方面着手清理烈士遗体，将抛露野外已达十多日的杨永治、李昌智、吴盛德遗体护送柏林，吴武城、张洪相遗体前期被家属接运走，刘安金被群众安葬在四面乡下场口。三月二日下午在柏林小学大操场召开追悼大会，到会的家属，革命同志和人民群众泪流满面，悲痛万分，愤怒声讨匪首丁文皋的滔天罪行。一方面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宣传党的镇压与宽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两天之内，就有二百多人自动向政府交枪、交弹，悔过自新登记。

中路一个连由区委书记李葆良同志带领，进驻第十区政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整顿社会秩序，开展新的工作。

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平息四面山土匪暴动的战斗基本结束。打死匪首一名，打伤土匪中队长一名，死伤匪徒数名，俘虏数十名，登记自新二百多人，缴获枪支一百多，子弹数千发。号称一千多人的匪棚被彻底打垮，解放军无一伤亡。

但是，由于全县各地土匪暴乱四起，一〇四团三营很快就撤离四面、柏林，土匪没有得到及时肃清，至一九五〇年下半年清匪反霸斗争中，其余土匪才受到政府的法律制裁或宽大处理。

## （五）

六位烈士简介：

杨永治，男，年约十八岁，贫农子弟，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太平乡地下党支部副书记，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与敌人斗争英勇。

吴武城，男，年约二十五岁，柏林乡人，工作组负责人，是柏林地下党培养发展对象，解放时任四面乡中心学校校长。

李昌智，男，年约二十二岁，刁家乡人，解放前在太平乡回龙庙小学教过书。

刘安金，男，年约二十岁，武胜县烈面区人，江津县窑校进步学生。

张洪相，男，年约十七岁，太平乡人，筭溪中学学生，受过党的长期教育。

吴盛德，男，年约十七岁，江津县窑校进步学生。

六位烈士热爱党，热爱人民，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为党和人民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怀念。

江津后八景

（明）江 渊

### 许溪烟雨

人家比屋临溪渚，	翠树层层霭烟雨。
放舟拟作潇湘游，	玄圃沧洲渺何许。
推窗坐对心神娱，	彷彿湘兼开画图。
几回误认綰川曲，	落红飞絮春模糊。

## 澄海汕头沿海抗日回忆

卞稚珊

一九三八年我任广州行营少将高参时，行营驻在原黄埔军校校本部，我亲眼看到日机肆无忌惮地炸沉停泊在黄埔港靠近英国商轮的“中山”军舰的情景，从而感到这是继“七七”事变后日军南侵的预兆；适广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吴铁城为了加强所属二十一个保安团的战备，特调我到保安处负责战备事宜。由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停战协定签字之后，需要办理接收事宜。当时吴铁城任上海市市长兼接收委员会主委，我任首都保安总队长，与国民党陆军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旅长宋希濂分兼南京南北城防指挥官。后我奉国民政府命从日军手里几经险阻，才接收了南翔、真如、大场、江湾、吴淞炮台一带战场。收回了数以万计的枪炮弹药和军用物资。因此，我与吴接触较多，私交亦厚。由于有这一关系，使我这次到保安处得以放手调整分布于全省沿海和水陆交通线及省属各机关的防务和警卫，既完成了平时的勤务，又作好了战争准备，以期能有力地配合正规作战部队的行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南抗日战争已迫在眉睫。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广州沦陷前夕，即十月二十日晚十时，吴铁城以紧急电话命令我：日军已在淡水登陆。驻广州部队一律沿粤汉铁路向北转移；担任沿海警戒及护路的保安团队，在完成任任务后，转入敌后游击，省府及其所属各机关由卞稚珊

负责指挥并掩护，沿公路经从化、翁源、至韶关，限二十一日凌晨一时全部撤离广州市区，违者军法从事等语。我当即按照预订计划，利用各种通信设备紧急通知各有关单位，按计划使用各种交通工具，沿指定路线立即出发，我最后率车队一连断后作掩护，行至从化途中曾发现敌便衣侦探二起，从而判断我军设在增城一线的永久性防御阵地已被突破，情况急转直下，严重威胁我军侧背，大有截断我军退路之势。当我经过从化到达良口时，已经是凌晨二时。按照命令应该将良口桥梁按时炸毁，阻敌追击。但我并没有按计划执行。主要是我分布在广州市郊的十二门最新式高射炮还未通过，若放弃，则损失太大，反以资敌；不炸毁，违抗命令，后果严重。当时我采取紧急措施将良口及其以北接连三座桥梁都安装好炸药包，各派兵一排扼守，我则亲自指挥最前线的良口桥梁，掌握炸毁的时机。一直等到四时，全部高射炮通过后，我刚把良口桥梁炸毁，敌坦克即追至，被阻于桥梁南侧，我继续将良口以北第二、第三座桥梁炸毁，省府及其所属机关人员和辎重得以全部安全撤至韶关。而沿粤汉铁路北移的部队则被敌机滥炸，损失惨重。事后，吴铁城在韶关论功行赏，慰勉有加。并征求我的意见，意欲加重我的职责，调任保安第四旅旅长。当时我考虑到该旅所驻海南岛是敌人必争的战略要地，战争有随时爆发的可能，部队未曾亲自训练过，海南语言比广州话更难懂，由于存在这些问题，我当即婉词谢绝，吴对此亦有同感。于是我要求将我调到潮、汕一带。他说：广州沦陷后，日寇第二步必然入侵潮（州）、汕（头）。潮、汕警备司令华振中所属将领不是保安同学；就是黄埔同事。为了有利于抗战，地方实力必须配合华军作战。省府决

定任命你担任澄海县县长兼澄（海）汕（头）沿海游击司令。另拨省保安温轰一团归你直接指挥；再加两个自卫大队、两个壮丁常备队、一个警察中队，已是一旅之众。如果做好群众工作，与群众打成一片，也是大有可为的，相信你能够作出成绩的。对此，我不能再辞，只好应命。这是一九三八年冬的事。

我到澄海接任时，只带二三名广东籍随员。当时为了集中精力加强备战，我乃电曾任黄埔军校第六期战术教官的卞孟英由川赶来全权代理县政事宜。我则专心致力于加强备战和团结群众。从我当时的本职工作来说，是负守土重责。从我的军事任务来说，则是牵制敌人，争取时间。因此，我将温轰一团列入华军的战斗行列，担任汕头以东至澄海的沿海岸警戒，沿岸构筑宽深各五米的水濠，阻敌橡皮艇登陆。韩江下游四条支流都贯穿在澄海境内，防不胜防，因此，宣传、组织、训练群众工作显得十分重要而迫切。我利用澄海这个侨乡的习俗，每逢旧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各乡都选定其中一天作为该乡村特定游神节日，家家宰鹅祭神还有全乡请戏演剧。其他各乡都赶来庆祝，热闹非常。我抓住这一机会，先在城郊的宁美乡利用戏台作讲台，宣传抗日救亡人人有责的重大意义。而其他各乡镇见此，皆引以为例，纷纷前来邀我参加他们各自的游神节日。就这样，深入实际，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渐渐和我建立起感情和信任。这对我后来能在敌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坚持抗日是一重要因素。

当我正在紧张地进行备战工作的时候，日寇南侵的风声也越来越紧迫。我突然接到广东省政府转发国民党中央两份密件。一是要我注意当时澄海的“青年抗日同志会”（以下简

称青抗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不要作为依靠力量;一是要我严加防范当时任澄海自卫大队长的李少如,是现任香港已经投敌的前桂系军阀刘志陆的副官长,已证实他们之间有密切联系等情。根据上述两个密件的要求,结合我当时掌握的材料,我决定以是否有利于抗战为准绳,采取了分别对待的办法:李少如是地方势力,根深蒂固,不能操之过急,应因势利导,潜移默化,既不利用,也不打击。至于“青抗会”全是本县十三四岁至二十余岁的男女学生组成。平时遵守纪律,战时服从指挥,对工作从不讨价还价。为了有助于抗战,我对他们的活动,皆给予有力的支持。后来实践证明,他们以满腔爱国热忱,为抗战工作做出显著成绩,这在澄海抗日史上应有他们的一定地位。

日寇沦陷广州后,于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发动海陆空军占领汕头,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经过一番激战,我方伤亡甚重,华振中部及温团皆撤离汕头沿海,转移到潮州北面据险防守。六月二十七日敌军攻占潮州。六月二十九日日军由潮州沿韩江南侵澄海。当时,我澄海守城部队仅有一个自卫大队、两个“壮常队”、一个警察中队,均无机枪与大炮的配备。而李少如大队驻防县城与东陇之间,不及集中使用。在这样的形势下,不能硬拼,只宜巧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军民牺牲,只得暂撤至北门外长堤一带待机行动。敌进城后,亦未追击。见我不战而放弃城池,满以为可以高枕无忧,遂放任敌伪官兵到处抢劫财物,大吃大喝,闹得满城风雨。直至中午获悉敌皆酩酊大醉,纪律松弛。我见时机已至,即派便衣从县府后门城墙缺口潜入城内,约定一闻枪声即发动群众内外呼应,大声呐喊,造成声势,压倒敌人。迨午

后一时许，趁敌军正在酣睡之际，我即亲率警察中队和两个“壮常队”从城墙缺口冲入。自卫大队则绕道截击敌伪在南门江面所搭浮桥。当我枪声一响，全城响应，敌从梦中惊醒，仓惶奔向浮桥逃命，仅仅经过两小时的搜索和追击，敌人逃回汕头，我未穷追，战斗结束。总结这次胜利，主要是军民一致，同仇敌忾；其次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而能以劣势胜优势。遗憾的是袭击部队行动不够迅猛，未能全歼敌人，敌伪伤亡仅三十余人，缴获步马枪七十余支。我以为敌伪受此痛击，短时间不敢卷土重来，岂料而事变之来又出人意外。

经过上述一战之之后，我调整了军事部署。命令县级机关非作战人员全部调到东门区署所在地办公。我设临时指挥所于城中一陈姓华侨住宅内，并派一个自卫大队在南门设防，封锁汕澄轻便铁路。其余部队则驻守北门待命。通告各有关单位照常工作，商店照常营业，清查户口，严防汉奸潜伏。殊知城内秩序刚稍稳定，七月十六日凌晨，敌伪先利用汉奸割断我通往各区乡电话线。然后从敌舰发射大炮轰击县府，以掩护橡皮艇分三路向南门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此时城内秩序已乱。枪炮声、爆炸声、哭喊声，震撼全城。尤其是汉奸四出活动，收买的流氓阿飞造谣滋事，划路标，照反光镜，为敌卖命。我曾一再命令驻北门的预备部队增援前线，卒无回音。在这样的混乱局势下，好心肠的房东和其他士绅坚决劝我留在陈宅，暂避其锋。但我不能只顾自己，脱离队伍。立即带我身边仅留的两名卫士持枪实弹冲向南门，而南门战斗已移往东门。为了亲自督促驻北门的预备部队增援前线，迫我跑到北门，而该预备部队已去东门河堤掩护自卫大

队渡河正激战中。我正跟踪前往，刚一登上河堤，即发现敌伪分三路沿河堤自西迎面冲来。我面临韩江三面受敌，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恰遇社区长所乘渡船将离岸，在我跳上该船时，便发现上游一船驶抵江心，正遭敌机枪打翻，时正倾盆大雨，枪声却为风雨声所掩盖。当我船行至江心，发觉雨点溅在水面不是向上，而是向前，始悉敌人已向我船扫射。我即命卫士罗材下水试探，恰遇退潮，水仅齐颈。我又命船上军民马上跳水散开，但仍有数人手扶船沿前进，卒被敌人机枪击中，船翻人亡。我则停立水中不动，反幸脱险。但县城已陷敌手。日军进城后，任由官兵奸淫掠杀，甚至连教会的神甫及妇孺均难幸免。是役我军民死伤七八百人，毁民房数百间。从此我便与省府、专署、华振中部队均已中断联络，进入孤军作战状态。

此后，我以东门为据点，该地面临海濒，背靠绕平山地，较有回旋余地，有利于敌后的游击战。为了牵制敌伪，凡遇其主力向潮汕以北进攻时，我即派队袭击澄海敌占区，截断敌后交通线，迫敌回师向我反击，我又退守东陇一带，形成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拉锯战。久之，敌不能耐，遂据守碉堡顽抗，我则军民配合，经常进行夜袭。敌苦于应付，终于是年夏秋间派出军舰载敌机，向东陇狂炸，致毁房数百间，死伤数百人，但未敢登陆。回忆当年侨乡父老爱国热情，共赴时艰的义举，特别是“青抗会”的同志们，在那艰苦的岁月，不怕牺牲，不要钱，不要粮，每次都能出色地为我完成与敌占区的联络任务，使我铭记不忘。

一九三八年冬李汉魂接替吴铁城任广东省主席。全省保

安团改编为暂编第二军，委原保安处长邹洪任军长，调我再长戎幕，澄海县长遗缺交李少如接替，此一九三九年冬的事。

江津八景 （明）江渊

华盖晴岚

长风捲雨开晴昊， 画障苍苔淡如扫。  
远山不肯放修眉， 黛色时时露纤巧。  
我家正在山中居， 浮岚叠翠满阶除。  
共诧深林隐玄豹， 十年不出将何如？

华峰春晓雨晴时， 岚气凝云起欲迟；  
冉冉暂随林雾聚， 飘飘还借谷风吹；  
从龙出岫宁无意， 捧日当天会有期；  
未凝为霖苏万汇， 山间草木已蕃滋。

## 陈独秀在江津

罗宗文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机关林立，人口骤增，供应紧张，居住困难。兼之，敌机轰炸频繁，1939年“五、三”“五、四”以后，（五月三、四两日连续大轰炸）很多机关、学校和居民，都纷纷向外地疏散。江津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大县，在重庆上游一百八十华里，每天都有轮船上下，在当时算是交通最方便的。地方富庶，物产丰富，市场繁荣，学校众多，文化比较发达。因之，疏散在江津的机关学校以及知名人士特别多，陈独秀就是其中的一个。

1940年九月半，我调到江津任县长，到任之初，照例是要对当地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一次礼节性的拜访，我去拜会了陈独秀。当时正值粮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受到极大的威胁。彼此寒暄了几句以后，陈就问我：“现在粮价飞涨，怎么办？”我说：“省府的指示是叫压一下。”（当时四川省政府命令各县把粮价压低在某一天的价格上，不准自由涨价）。陈说：“压也不是办法。”我说：“当然，硬压是无效的。不过，我刚刚到，对地方情况，不够了解，还没有制订平抑粮价的具体措施，省府的命令，当然也要因地制宜才行。”因为我预先约定还要去拜会另一知名人士欧阳渐（竟无），也就匆匆告辞了，没有继续谈下去。

不久以后，陈独秀到县政府回访了我。当时县府疏散在西门外鲤鱼石临时办公处，离城约两华里，他是步行去的。一

坐下，他就说：“孙哲生又在放大炮了，他主张粮食公卖是行不通的。”（孙哲生即孙科，是当时国民政府的立法院院长，他在中央纪念周作了一个“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的报告，其中谈到“重庆的米价，已涨到150—160元一石——量米的容量，一石等于150市斤，如果粮食国营，操纵、囤积等弊，得以一扫而清……”原报告在报上发表了。）陈接着说，中国的农民很分散，生产规模小，每年收获以后，自己把粮食保存起来，连罈罈罐罐都是他们的储藏工具，遇到需要钱的时候，就拿一部分出来，自己想办法加工成米，或者籐、或者舂、或者碾，肩挑背负，运到邻近的场镇去卖，然后买回他们所需要的油盐和其它日用必需品。也就是说，他们的家，既是仓库、又是加工工场，农民既是仓库保管员、又是加工工人，又是运输工人，又是销售商人，是十分方便的。如果全部都由国家来包干办，既要修仓库、又要修加工厂，又要组织运输，又要设立销售，要花多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哪里是容易办得到的事呵！不比在苏联有集体农庄、美国的大农场、是机械化耕种，生产规模大，办起来方便。（以上是陈谈话的大意）当时我听到他那一番议论，觉得很有道理。但从解放以后的事实来看，党和政府的粮食政策，成功地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保证了供应，无论仓储、加工、运输、销售等每一个环节，都由政府派人管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定量配给，凡有居民聚居处，都设有粮食供应点，尤其是遇到自然灾害，粮食歉收的地区，政府不惜花费巨大的运输力量。由国库补贴巨额损失，酌盈剂虚，互相支援，在保持原有价格不变的前提下，保证了供应。这是解放以前以及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设想的，绝对办

不到的。这些事实证明陈独秀是一个没有接触实际的学者、空谈理论的革命家，而根本没有足够的担当、气魄和办法来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上面临的具体问题。

我当时见到陈独秀，已经衰老了，身体很差，简直看不出他曾经是那样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有时碰到他一人在街上走走，有时还携带着一包中药。鲤鱼石附近有一个省办的柑桔研究所，果树很多，环境很好，有一天下午，我去散步，陈也来了，他告诉我他患高血压，又是胃溃疡，他介绍我多吃柚子。

陈独秀的书法很好，我看过别人介绍他写字的文章说，他认为“写字既要有天分，又要有功夫，天分表现在外秀，也要下功夫锻炼内劲。”我看他的字是达到了“内劲外秀”的境地的。他在江津。偶尔也替人写一点，写的多半都是旧诗。他给我写的一张条幅（半幅四尺宣纸）是杜工部的七律“曲江对酌”，第二首的后四句：“穿花蝴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1924年三月下旬，我调往铜梁，要离开江津之前，又送纸去求他写付对联，他写的是“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并在边上题云：“宗文先生长斯邑年馀，今调赴铜梁，出纸索书，因集散氏铭以赠，即乞政之。独秀。”下面盖了两方印章，一是他的名字，一是“仲甫”二字。殊我刚一到铜梁县，即在报上看到陈独秀逝世的消息，那付对联，可能就是 he 最后写的了，我裱好珍藏在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主动把家里所藏的书籍、字画，全部上交了，但不知那付对联和前写的条幅，还存在否。

在江津时听说，我到任之前，陈独秀偶然在街上地摊发

现一本研究小学（文字学）的书，署名是江津杨鲁庭所著，他认为写的很好，因而到处打听杨的情况。地方人告诉他，杨是前清的一个廪生，很有学问，很受地方人的尊敬，但已去世了，家住在离城十馀里的鹤山坪，家里还有人在。他竟亲自到乡间去访问杨家，并搬去住了一段时间，代杨氏整理遗稿成书。杨的后辈杨学渊，字冰熟，1938年春，曾继我任过重庆市教育科长，与我相熟，有一次我在重庆与他相遇，问起这一经过，他证实确有其事。我告诉他陈的旧文学的造诣是很深的，他欣赏的东西，一定有很高的水平，更难的是经他亲自整理出来的，这书与政治无关，应该拿去出版。他答应了，但没有实行，不知原稿还在否？解放初期，可能是1952年左右，我在重庆街上碰见过杨学渊，他匆匆告诉我他在重庆九中（李家沱附近）当语文教师，也就没有再谈及这件事了。

陈独秀在江津，有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女性与他住在一起，可能就是在上海接的那个女工，我没有见过。江津城内，有一个私立儿江女中的校长吕秀珍，安徽人，是他的外甥女。另外有一个青年皮鞋工人，是哑巴，在那里修理皮鞋，听说是他的亲属，但我没有见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陈独秀写了一篇讨论时事的文章，分成上下两个大段，送到重庆《大公报》发表，结果只登了上半段，下半段没有继续登出来。这篇文章在国内有何影响，我不知道，但在江津，却引起了一点反应。在我主持召开的一次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6周年的群众大会上（在东门外体育场），有一个叫林铁庵的，也是安徽人，疏散在江津，早年参加过孙先生领导的革命，年岁较长，双目失明，爱交

际应酬，常由他的两位成年的姑娘，轮流陪他参加私人宴会及一些公共集会，大家都以革命老前辈尊称他。他很关心时事，每天都由他的女儿把报纸读给他听。在那天的大会上，他被推去讲了话，他厉声批评陈独秀，说他乱写文章在报上发表，散布消极情绪，不利于抗战云云，我想《大公报》之所以没有继续发表他那篇文章的下半段，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

江津八景 （明）江渊

古寺晓钟

翟县夜半吼长鲸，	天风吹落云间声；
几多求利逐名者，	匆匆车马奔遥程；
部屋谁知有贤士，	寤起烧灯究经文；
满朝却听长乐起，	肥马貂裘艳青史。
谁扣蒲牢向夜分，	通城烟火动尘氛；
催残银海千家月，	散彻瑶空几片云；
遊客梦回思远道，	老僧出定厌声闻；
缅怀骑马趋长乐，	三十余年颇效勤。